绪　论

重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胜利，是人类进步事业的胜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族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和重要的历史贡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对打破帝国主义奴役压迫，推动世界一切殖民地和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也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在这场伟大的战争中，重庆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所在地，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的指挥中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也为赢得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重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的历史地位

（一）重庆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战时首都

抗战之前重庆是隶属于四川省的省辖市。1937 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平津沦陷，随后又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随后沿长江一线直逼首都南京。形势已十分危急。10 月 29 日蒋介石召集国防最高会议，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确定四川为抗战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1937 年 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重庆即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重庆也因此而成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1940 年 9 月 6 日，国民政府发布训令，明定重庆为国民政府“陪都”。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 年 12 月，蒋介石下令编制“（重庆）十年为期之建设计划”。1946 年 2 月 5 日，蒋介石宣布“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①。次日，重庆市政府成立陪都建设计划委员会，开始编制《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案》。

综观抗战八年的历史，抗战时期重庆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首先，“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1937 年 11 月—1946 年 5 月），而“战时陪都”的历史只有五年多（1940 年 9 月—1946 年 5 月），可见，“战时首都”的历史覆盖了“战时陪都”的历史，“战时首都”是重庆城市在抗战时期历史的主体；其次，1937 年国民政府“移驻”重庆的实质就是把首都的功能从南京移到重庆，“移驻”之日就是“首都”功能转移之时，也是重庆主体功能转移之时；第三，1940 年 9 月定重庆为“陪都”这只是对重庆战时首都功能的确定。所谓“陪都”，是对“首

① 1946 年 2 月 6 日《中央日报》。

都”之外担负“首都”职责的其他城市地位的确定。定重庆为“陪都”，既是明确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更是显示即使南京陷落，中国也要抗战到底的决心。

（二）重庆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所在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政治舞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历过了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的洗礼，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把党的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统一起来，提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发展，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抗日战争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两大基本问题，一个是如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一个是如何通过抗日战争在中国实现政治民主，以实现中国人民的解放。这两大历史任务神圣而又沉重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肩上。同时，举国上下，民心所系，民意难违，中国一切政党、政治派别也都必须回答“抗日”和“民主”这两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而这也就为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必要的政治准备。

国共合作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但是国共之间除了抗日，在其他政治问题（尤其是民主问题）上没有共同点。国民党是执政党，控制着中央政府和绝大部分地方政权，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和占绝对优势的军队。虽然国民党被迫同意共同抗日，但顽固坚持独裁，坚持“溶共、限共、反共”，不断制造政治军事摩擦，企图在抗战中消灭共产党的力量。而共产党没有合法地位，为了自身的发展，在坚持抗战的同时，也不能不对国民党展开有理有节针锋相对的斗争。这就引出了许多复杂问题和尖锐矛盾。不解决这些问题，国共合作就不能持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就可能瓦解。

面对这种危机，两党之外的中间势力便成为决定双方力量对比的关键。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吃过“左倾”路线的亏的。现在则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①，因此，总结出了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的一条基本经验，即“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要把这三个环节视为不可分离的一个整体。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已逐渐形成了两条战线、两个战场：一个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武装斗争，这是革命的主战场；一个是党领导的国统区地下工作战场②，后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统一战线，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变化，国统区战场的地位益显重要。

因此武汉沦陷后，随着国统区的中心向重庆转移，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设立南方局，担负原长江局所负使命，即“代表中央向国民党及其他党派进行统一战线工作以及指导南方和大后方各省党的工作”③。故南方局的天然使命就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为抗战民主凝聚力量，其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和贯穿始终的工作就是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争取中间势力。由于国统区实际上成为执行统一战线政策的主要阵地，因此，南方局这一时期的统一战线工作，也就具有了全局性的地位。

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国际国内风云激荡、政治斗争纷繁复杂。南方局既处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也置身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之中，时刻经受着信念、意志与生死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48页。

②参见《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3页。

③《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73页；《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8页。

考验。从国民党顽固派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在统一战线内部制造分裂发动三次反共高潮，到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玩弄种种假和平真内战阴谋，南方局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始终高举抗战民主旗帜，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广泛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以卓有成效的工作把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民主党派阵营的形成，为建立新中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格局的开创，从理论到实践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次国共合作是中国政治制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历史阶梯。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对中国政治制度分别提出和实施了各自的主张。中国共产党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政党制度、国家领导制度、政治协商制度进行了成功的探索，为改造旧中国、创立新中国政治制度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

国共合作的建立是对国民党一党制的初步冲击。中共提出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主张及其成功实践，迈出了建立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一步，为新中国的成立和民主党派对中共领导地位的确认，并最终建立起新中国政党制度奠定了重要基础。

国民参政会是抗日战争时期由国民政府成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全国最高咨询机关，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参政会于 1938 年 7 月在武汉成立，同年迁到重庆，1946 年迁回南京，1948 年 3 月结束。总共开过 4 届 13 次会议，其中 11 次会议是在重庆召开的。在国共合作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成立了参议会制度，这是中共创造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新中国人大制度的雏型并为新中国政权建设积累了成功经验。

“两党遇事协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特殊组织形式。中共在抗战时期正确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的成功实践，催生了旧政协的召开，形成了“政协路线”，这是中共推动政治协商制度产生的成功尝试，是中共七大路线的胜利，也是新中国统一战线的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织形式——新政协——新中国政协制度产生的重要基础。

（三）重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重庆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在远东的指挥中心。

首先，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 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事实上从亚洲首先开始，接着 1939 年欧洲战争爆发，1941 年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由此全面展开。由此证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辟最早，事实上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而且中国战场持续时间最长，始终没有停止过战斗，直到日本法西斯最后投降为止，时间长达 14 年。中国人民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既是爱国自卫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中国战场不是孤立的，世界各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是互相支持的。中国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抗击和牵制日本陆军的 2/3 以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伤亡总数超过一亿人，死亡人数 5 500 多万人，其中中国军民伤亡达 3 500 万。战争中，中国财产的直接损失达 1 000 亿美元。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次，中国战场不仅是世界反法西斯的重要战场之一，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它牵制并大量歼灭了日军有生力量，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日军的绝大多数兵力用于中国战争；盟军对日作战所毙伤日军的 70% 在中国战场，这是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死伤总数的 8 倍，是苏军击毙日军总数的 31 倍。中国战场始终是东方战场的主战场。在整个战争过程中，中国战场在东方始终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三，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重庆人民就展开了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中国局部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1 年 12 月 7 日太平洋战争爆发，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大大提高，

重庆成为中国战区统帅部所在地。12月9日，国民政府在重庆正式对日宣战。12月23日，中、美、英在重庆举行军事会议（史称“东亚军事会议”），正式结成三国军事同盟。1942年1月《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中国成为同盟国四强之一。1月3日，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中国、泰国、越南等地区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史迪威同时兼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重庆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远东的指挥中心。

对于这一段艰难的岁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曾经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起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吞并埃及，切断通过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①；英国首相丘吉尔曾经指出：“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苏军统帅斯大林曾经指出：“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②。正是基于中国战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美国人把中国看做几乎同大英帝国相等的参战大国，并且带头偏爱把中国军队同俄国军队相提并论。”③三位伟大统帅的评论和普通美国人的感受道出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中国抗日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具有重大的作用，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也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16页。

②《牢记历史　共护和平》，2005年5月9日，《人民日报》。

③罗伯特·达莱克著：《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下册，商务图书馆1984年版，第474页。

道出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重庆的历史贡献。

二、重庆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大贡献

（一）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重庆人民团结在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旗帜下，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

坚持抗战到底，这是中华民族的决心，也是一切抗日党派、团体和人物的基本点。但是，要准确把握抗战到底的意蕴，真正要坚持抗战到底，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既要取决于坚持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决战决胜于战场，又要取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一致，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诱降，决战决胜于政坛。重庆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围绕这两大任务，上演了可歌可泣、威武雄壮的活剧。

重庆是日本军事进攻中国的重要战略目标，但日本的军事进攻并没有摧毁重庆抗战的意志与决心。

七七事变以后，日军对中国大举进攻，相继攻占了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中国首都南京、中国九省通衢武汉、中国中南重镇长沙和中国南方最大城市广州，日军进逼宜昌，兵锋直指重庆。但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由于日本兵力的捉襟见肘，战争并没有实现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目标，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攻占重庆的目标，日军的进攻在长江三峡面前终于停了下来，而陷入长期战争的消耗之中。中国的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为了摆脱困境，日军被迫改变侵华方针：一方面加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另一方面加强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政治诱降和军事进攻。1938 年 12 月，日军大本营发布了《大陆命第 241 号命令》，下令对中国开展“制空进攻战”，“压制和扰乱敌之战略及政略中心”—— 这样，自侵华战

争以来以直接协助地面作战为重点的日本航空兵团，在占领武汉以后就转向了重点攻击中国内地。重庆就成为日军战略轰炸的首选目标。日本企图通过对重庆的轰炸，造成大后方经济的破坏，造成人民厌战情绪的增长，特别是通过对重庆的轰炸，与其政治上对国民党政治诱降相配合，动摇国民党抗战军心，造成国民政府的崩溃，从而摧毁中国继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因此，重庆成为遭受日本野蛮轰炸规模最大、次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损失最为惨重的中国城市。

从 1938 年春到 1943 年夏，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联合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狂轰滥炸，史称“ 重庆大轰炸 ”。在多次外围轰炸后，1939 年 5 月 3、4 日，日机第一次大规模轰炸了不设防的重庆市区（史称“ 五三、五四大轰炸 ”），造成重庆市民极其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1940 年 5 月 13 日，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部达成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代号为“ 101 号作战 ”，作战时间预定自 5 月中旬起约三个月。从 5 月 18 日到 9 月初共 110 天内，日机先后对重庆市区和梁平、北碚、巴县、江北、合川、铜梁、璧山、江津、綦江等地进行轰炸，地域之广泛、轰炸之频繁、死伤之惨重，罄竹难书。1941 年，为了尽快结束中国战事，集中兵力南进，日本大本营发出《大陆命第 925 号命令》，命令侵华日军“ 迅速处理中国事变 ”。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决定以全力投入夏秋之战，发挥空中和地面的综合战力展开全面攻势，“ 以期彻底摧毁敌人继续战斗的企图 ”。从 5 月起，日本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在正面战场发动长沙会战，企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为了配合地面进攻，制定了《第五次内地空中作战计划》，对中国内地实行大规模轰炸，并再次把重庆作为战略轰炸的重点，轰炸目标包括居民区、商业区、军政机关、工厂、学校、外国使领馆等，对重庆的摧毁达到空前惨烈的程度，美国、苏联大使馆和停泊在长江上的美国军舰图图拉号也未能幸免。 6

月，日机轰炸更加频繁，并采取“疲劳轰炸”战术，于6月5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五大隧道惨案”，伤亡惨重，难以计数。

到1942年，由于日本持续几年对重庆的残酷轰炸并未达到其战略目的，空中作战以失败告终，于是日军开始酝酿从地面攻占重庆的《重庆作战》计划。7月，日本大本营和侵华日军司令部决定实施其梦寐以求的攻占重庆的计划，规定作战方针是“歼灭敌中央军主力，攻克重庆，迫使重庆政权屈服或崩溃”，其具体作战计划是，日军一部由西安至广元和汉中方向进攻四川，占领成都，夹击重庆，日军另一部沿长江、经三峡，攻入四川，占领重庆。日军为此进行了充分准备，计划预定在1943年春季发动进攻。但是，由于受太平洋战争牵制，在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情况下，日军不得不在年底宣布取消重庆作战计划。到1944年，日军再次侵入广西、黔南，占领独山，重庆震动，但终其抗战之期，日军也未能侵入重庆一步。

“重庆大轰炸”历时之长，范围之广，所造成的灾难之深重，在二战期间和整个人类史上创下了战争史的新纪录。重庆大轰炸与七七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等重大事件一样，给中华民族造成了惨痛的牺牲和巨大损失。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滔天罪行和不容抵赖的铁证。日本军事评论家前田哲男称：“对一个城市如此长时期固执地进行攻击，不用说在航空战争史上是第一次，就是把地面部队围攻城市的历史包括在内，也是极其罕见的。”在这场民族的巨大灾难面前，重庆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不畏强暴，不惧艰险，顽强抵抗，坚持生产，赢得了全中国人民的支持和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敬佩。194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专门书赠重庆一幅卷轴，他写道：“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

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爵士在 1942 年 6 月 14 日发表广播演说，盛赞“中国仍屹立不移，足以象征中国不屈不挠意志与决心之重庆，乃成为全世界各地家喻户晓之一名词。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庆乃联合国家所为振奋之精神之象征；为独裁者而言，重庆乃若干民众甘冒危险忍受痛苦不接受侵略者之束缚之象征。……重庆直可与世界任何城市比较而无愧色。重庆之成为世界理想中之一项事物，实无足异”①。

国民党是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抗战时期国民党掌握着国家政权，拥有庞大的武装力量，对外代表国家，在抗战方面起着主导作用。1938 年武汉、广州失守以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华政策从军事进攻为主转变为对国民党政治诱降为主，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经受着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在执政的国民党内部，投降势力开始抬头，身任国民党副总裁、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汪精卫，在重庆大放“和平”烟幕，制造投降舆论，危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同志曾亲自致电在重庆的汪精卫，告诫他当此全面抗战面临严重关头的时候，除继续“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外，特别要“坚持举国上下精诚团结之民族统一战线”②。中共和各中间党派的规劝与批评没有能够阻挡汪精卫投降的决心。 1938 年底，汪精卫从重庆出逃越南，就公开叛国投敌。

武汉广泛失守后，国民党的抗战政策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抗战初期的积极抗日转变为消极抗日，从联共抗日转变为反共、溶共和限共，顽固地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治。抗战初期蒋介石就提出以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名义，将中共合并于国民党

①《民国川事纪要》下册，（台湾）四川文献研究社 1974 年版，第 185 页。

②毛泽东：《致汪精卫、张伯苓电》， 1938 年 10 月 28 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个大党”，达到“溶共”目的，对进步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也是采取压制甚至迫害的手段。

中国共产党真心诚意地努力实践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遵循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到底，努力实现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因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而使人民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统一战线中的阶级关系，广泛团结中间势力，坚持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从政治上、舆论上与国民党破坏合作、制造分裂的行径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军事上时刻作好应对的准备，以军事自卫配合政治进攻，努力维系国共合作不至于完全破裂，把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始终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以利于抗战大业的实现。在这一历史阶段，由于南方局在重庆卓有成效的工作，妥善处理了皖南事变前后国共合作几度出现的危局，成功地避免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破裂，维护了民族抗战的大局。坚持原则、敢于斗争，又注意和讲究斗争策略，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对待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一个重要政策，达到了“合而不同，斗而不破”的目的。

在抗日战争中，重庆没有被日军占领，重庆人民的意志与决心没有被日军的轰炸所摧毁，以重庆为主要舞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被分裂，坚持抗战到底，直至最后胜利，这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国共合作的胜利，是全民族的胜利，也是重庆人民的胜利。

（二）作为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中心，重庆承接了中国生产力布局的重大调整，构筑了战时中国的经济基础，支撑了抗战危局

60年过去了。当我们重新审视抗日战争这段峥嵘岁月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重庆的历史贡献既在于政治上的

国共合作，军事上的对日抗战，也在于重庆人民为支援抗战而贡献的人力、物力、财力，乃至热血与生命，还在于，抗日战争造就了重庆城市经济的基础——大后方经济中心——重庆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它从经济上支撑了抗战大业，实现了中国生产力的重新布局，形成了完全意义上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加快了重庆的城市化和近代化的进程，奠定了几十年来重庆努力建设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基础。

唐宋以后，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日益开发，中国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四川的商品经济因而获得了较大发展，通过长江加强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经济联系，成为四川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重庆以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开始由封闭的军事和行政中心向开放的经济中心发展。

重庆经济中心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初步形成”阶段（19世纪70年代—20世纪30年代初）。以《中英烟台条约》（1876年）及其《续增专条》（1890年）的签订和重庆开埠（1891年）为标志，重庆开始了它的近代历史。重庆首先成为了商业中心，继而形成主要为商业服务的金融中心，商业活动的频繁又刺激了交通中心的形成，最后是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初步发展。重庆城市经济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种局面的出现，就改变了重庆城市的功能，标志着重庆经济中心的初步形成。

第二阶段是“完全形成”阶段（1935年—1945年）。“完全形成”主要是抗日战争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工业中心的形成。城市经济不论是经济的总量，还是经济的结构，不论是经济的规模，还是经济的辐射力和凝聚力，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峰，盛极一时。就工业而言，抗战开始以后，中国沿海厂矿陆续内迁，经两年的辗转迁移，陆续在四川、云南、湖南、陕西等省重建生产。其中243家迁到重庆，占全国内迁工厂的54%，占迁川工厂的93.46%，从而建立起了一个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与

此同时，重庆作为商贸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确立，重庆作为金融中心地位的飞速发展，重庆作为交通中心的地位趋于完善。

抗日战争使重庆经济中心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跨出了长江上游地区，达到了整个大后方，从而以“中国大后方经济中心”的姿态独步一时。1937 年，重庆工业在全国仅占 1.96%。经过抗战，中国在大后方重新建立了重庆、川中、广元、川东、桂林、昆明、贵阳、沅辰、西安与宝鸡、宁雅、甘青等十余个新的工业区。在这一地区里，重庆工厂占了大后方的 31.7%，居第一位。大后方没有一个城市、一个地区能达到重庆工业的整体水平，重庆是名副其实的大后方经济中心。正是这样一个独立而不再依赖于外国，比较完整而足以支持抗战、维持人民生活的工业体系，成为重庆经济中心完全形成的标志。以城市经济发展为基础，抗日战争促进了重庆城市的全面发展，大后方经济中心——重庆经济中心的完全形成，也加速了重庆城市发展的进程。

（三）重庆作为中国大后方的文化中心，创造了一系列难以企及的文化成就，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座高峰

战时中国文化，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即以延安为中心的解放区抗战文化，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抗战文化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孤岛文化。代表这一时期文化主流的是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所谓民族的，即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来高扬坚持抗战的旗帜；所谓大众的，即运用不同的文化形式来服务于人民大众争取民主的强烈愿望；所谓科学的，即坚持用科学的理论指导文化建设，坚持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重庆抗战文化就反映了这一文化主流，并创造了繁荣的高峰。

促使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文化中心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是战时首都地位的确立。政治、军事、经济中心的形成，奠定了重庆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二是国共合作的实现。作为国共合作产物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简称第三厅）

是国民政府主管宣传的部门，是战时中国的文化领导机构。但它实际上是在周恩来领导下的抗日文化统战堡垒，共产党通过它在重庆团结了大量文化团体和大批文化人，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极大影响和推动了全国抗日文化运动的发展，使重庆抗战文化具有广泛的充分的代表性，成为名副其实的战时中国文化的中心。三是大量人口向重庆的迁移。人口的迁移促进了文化的交流，而迁移人口中绝大多数都是东南沿海地区的精英，这极大地改善了重庆的人口素质结构，因此重庆文化有了迅猛的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中心。

抗战时期重庆文化是中国大后方抗战文化的高地。抗战时期，以上海、南京为主体，包括北平、天津、广州、浙江等沿海地区的大批国立、省立和私立大中学校和研究所开始大规模地向以重庆为重点的内地迁移，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教育中心由东向西的大转移。随着重庆成为战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重庆也就自然地成了全国的教育中心。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教育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各级各类学校都得到极大发展。大批重要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机构、全国性学术团体陆续迁往重庆，加上具有研究功能的高等院校，大批科技精英云集重庆，使得重庆科学技术呈现出具有国家水平、学科覆盖面广、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并重等显著特点，使重庆地区的科学研究能力空前壮大。在自然科学中，不少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尤其以物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学、气象学等学科为甚。社会科学中，成就更是斐然，尤其是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成就了一批享誉中外的学术大师，产生了一批影响深远、名垂青史的著作。文学艺术是抗战时期重庆文化领域的标杆，在中国的文艺史册中留下了辉煌的一页。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无论是报告文学还是杂文、散文，也无论是戏剧还是电影、音乐、舞蹈、美术，以及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及考古事业、体育，重庆所创造的繁荣

与辉煌都是其他区域所难以企及的。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领导抗战文化积累了成功的经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中国共产党创造了政治上国共合作的成功经验，创造了容纳国民党和广大抗日民主力量在内的民主协商、联合政府的政治架构。同时，还创造了成功领导文化工作，使之成为解决抗日与民主两大时代课题，进而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因此，文化也成为团结和斗争的手段。南方局成立后，为加强文化界统战工作，成立了专门领导文化工作的“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后又改称“文化组”)。坚决贯彻党中央把发展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① 的指示，紧紧依靠文化界中的中共党员和进步力量，团结爱国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战进步文化运动。1940 年 9 月，国民党强迫解散三厅，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周恩来明确指出：“有一个给我们的地盘站住脚，不怕干不成事情。”他要求其中的党员“跳出圈子”去活动。实践表明，文工会确实跳出了“只准研究”的圈子，利用合法方式和丰富多彩的形式，团结广大文化界爱国人士，促进了抗战进步文化的繁荣发展，为推动抗战民主作出了独特贡献。皖南事变后，国统区进步文化活动遭到查禁。为保护进步文化力量，南方局即时制定应变措施，除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等身负重望的文化领导人留下坚持工作外，先后安排了 400 多个进步文化人从重庆紧急疏散。其中一部分到了香港，建立了由廖承志、夏衍、潘汉年等组成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使香港成了我党对国内外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南方局还成功地营救和资助了因抨击官僚资本而被国民党当局拘禁的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使他和共产党的关系日益密切，成

①《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1940年 9月 10 日）。

为共产党的诤友。为了打破皖南事变后沉闷的政治空气，南方局决定以戏剧演出作为斗争突破口，在阳翰笙、郭沫若努力下，迅速组建了“中华剧艺社”，以陈白尘《大地回春》话剧的公演，拉开了重庆“雾季戏剧演出”的大幕。从 10 月“中华剧艺社”演出《大地回春》始，到《棠棣之花》的成功演出，重庆雾季戏剧演出形成了第一个高潮，沉寂的山城开始活跃起来。同时，周恩来又提议文艺界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周恩来说：“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这次祝寿活动，是皖南事变后进步文化界的第一次聚会，不仅显示了进步文化界的力量，也一扫重庆上空的沉闷空气。此后，在南方局领导下，进步文化界为进步文化人举行祝寿活动蔚然成风，洪深五十寿辰、老舍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张恨水五十寿辰、茅盾五十寿辰等等祝寿活动广泛开展，充分体现了中共与进步文化人的亲密关系，增强了进步文化界坚持抗战、坚持民主的信心。

重庆抗战文化产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为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在艰难困苦的抗战时期，重庆进步文艺界创作演出了《戏剧春秋》和《愁城记》（夏衍）、《北京人》（曹禺）、《清明前后》（茅盾）、《风雪夜归人》（吴祖光）、《结婚进行曲》（陈白尘）等一批有艺术水平、历史深度的大剧。在四届雾季公演中，创作演出的进步话剧就达 242 台，这一现象被话剧史家们称之为中国话剧史上的黄金时代。重庆社会科学界创作了《十批判书》和《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侯外庐）、《中国史纲》（翦伯赞）、《中国社会史教程》（邓初民）、《二千年间》（胡绳），以及《从古代史到近代史》（廖沫沙）等一批研究成果，由此开拓了用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研究中国历史的新境界。自然科学界成立的“自然科学座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中国青年科学技术人员协会”等一批组织，团结和争取广大科技人员，为新中国凝聚和培养了科技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